

光复初期台湾左翼文艺思潮述论

刘小新 隋欣卉

摘要: 台湾左翼思潮在光复初期快速复苏并发展壮大, 形成左翼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相结合的思想主潮和文艺创作主流, 通过对中山精神的左翼解读、纪念、重读鲁迅等活动广泛而深刻地参与了战后台湾的文化重建运动, 开拓和发展出了文化重建层面上左翼的、民族的、大众的进步方向, 在“去日本化、再中国化”运动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光复初期; 台湾; 左翼; 文艺思潮; 思想遗产

DOI:10.13658/j.cnki.sar.2018.05.023

作者简介: 刘小新, 文学博士, 福建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隋欣卉, 文学博士, 两岸协同创新中心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I20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1569(2018)05 - 0192 - 15

光复初期, 祖国大陆大量知识分子来到台湾, 包括魏建功、许寿裳、歌雷、黎烈文、台静农、李何林、李霁野、雷石榆、黄荣灿等, 以左翼文艺精神加入战后台湾的文化重建运动。同时, 台湾本省知识分子龙瑛宗、王白渊、杨逵、苏新、吕赫若等台籍左翼知识分子, 以左翼的理论与文艺实践, 介入文化重建的场域。两岸左翼知识分子在光复初期的合作, 形成了左翼文艺思潮汇流与融合的大格局。

一、中山精神的左翼解读

光复初期台湾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台湾文学与文化, 重建首先面对的是如何理解日据台湾社会文化史的重大课题。由于人们对此认识的分歧而产生了“台人奴化”论和“中国化”的一系列论争。应该说去“皇民化”的确是战后台湾文化重建的急迫任务, 但“台人奴化”论却忽视了台湾民众和知识分子对日本殖民统治的长期而艰苦的反抗运动。这必然引起台湾知识界的反弹。在《我们的“等路”——台湾的文艺与学术》一文中, 左翼作家杨云萍指出“从文学界说, 我们的语言的大部分, 是被日人掠夺, 失去我们的表现的手段。这是致命的, 可是一面却因为由‘日语’的媒介, 得接触世界的一流的文学。所以我们虽是其数不多, 却对于文学

的鉴赏,或是评价,自信较祖国的人们的一部分,正确些。”^①一些知识分子如王白渊等都取这一思路来反对“台人奴化”论,这延伸出了至今仍然存在于台湾知识界乃至普通民众心理意识中的“殖民现代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台人奴化”论仅属于部分对台湾历史文化疏于了解的大陆知识分子,和极少数持有优越意识的外省籍知识分子。而抗战结束后由大陆来台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对于台湾人民日据时期的文化都秉持尊重态度。1946年8月10日,许寿裳在记者会上说明台湾省编译馆成立的要旨时,特别说道:“过去本省在日本统治下的军阀侵略主义,当然应该根绝,可是纯粹性学术的研究,却也不能抹煞其价值,我们应该接收下来,加以发扬光大。如果把过去数十年间日本学者专门从事台湾研究的成果,加以翻译和整理,编成一套台湾研究丛书,我相信至少有一百大本。”^②在9月5日的演讲中他又重申:台湾文化有两种特点,是各省所没有且可为各省模范的,就是国民教育普及,有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的基础;以及日本人留下丰富的台湾学术研究,可把它发扬光大,作为我们建国之用。^③许寿裳对台湾文化采取了客观、辩证和民主的态度,重视发挥其在战后文化重建的作用,对克服“台人奴化”论的不良影响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总结许寿裳的这一态度,诚如徐秀慧所言:“许寿裳对台湾学术研究的重视,与其说是继承日本人的学术遗产,不如说其出发点秉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许寿裳来台后积极鼓吹鲁迅思想,宣扬‘五四’精神,纠正了来台官员把‘台人奴化’挂在口上的优越意识。”^④的确,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化重建运动需要复兴五四新文化精神,需要以德先生、赛先生的精神为引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更加包容的文化胸怀对待历史和各种人文学术遗产,既要消除日本殖民主义文化的影响与遗毒,又不能不加分辨地排斥外来文化,更不能排斥在漫长的台湾社会生活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的特殊的文化经验。在“去日本化、再中国化”主潮中,确立以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科学、民主精神对待多元文化的立场与政策,是许寿裳对台湾文化重建的重要贡献。

光复初期,对台湾左翼知识分子而言,其使命无疑是重建被“皇民化”运动摧残而几乎凋零的社会主义文艺传统。此时的左翼知识分子对文学重建的认识大多取“人民的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路线。对此,杨逵在《文学重建的前提》和《台湾新文学停顿的检讨》两文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我相信唯有展开真正踏实的文学运动,才能开拓重建台湾文学的道路。”^⑤“新文学是人民的文学。”^⑥光复初期台湾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任务,即是探索台湾文艺的发展方向,重建“人民的文学”与“大众的文学”,确立新现实主义的美学方向。

这一时期左翼文论的重建工作主要是从左翼的立场解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45年创办的《一阳周报》和《政经报》都大量刊登阐述“三民主义”的文章,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这样理解“三民主义”的内涵:“孙文主义的终极目的是社会革命”,“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杨逵在《台湾文学对抗日运动的影响》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接受“三民主义”左翼立场:“今日台湾要建设‘民有民治民享而均富’的三民主义模范省,就要切实记住孔子在‘大同篇’所表

① 杨云萍《我们的“等路”——台湾的文艺与学术》,《民报》1945年12月2日。

② 许寿裳《招待新闻记者谈话稿——省编译馆的旨趣和工作》(1946年8月10日),黄英哲、许雪姬、杨彦杰主编《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③ 黄英哲《台湾省编译馆研究(1946.8-1947.5)》,张炎宪、陈美容、杨雅惠编《二二八事件研究论文集》,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出版(台北)1998年版,第100—101页。

④ 徐秀慧《光复变奏——战后初期台湾文学思潮的转折期(1945-1949)》,台湾文学馆(台南)2013年版,第34页。

⑤ 杨逵《文学重建的前提》,《和平日报》1946年5月,彭小妍主编《杨逵全集》第10卷,文化遗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台南)2001年版,第216页。

⑥ 杨逵《台湾新文学停顿的检讨》,《和平日报》1946年5月24日。彭小妍主编《杨逵全集》第10卷,第224页。

现的福利社会构想与‘不患贫患不均’的观念,也要切实记住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教示。孙中山先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却是继承孔子的大同思想,以达到均富,福利社会为目标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①

光复初期,台湾左翼知识分子以“三民主义”的政治理念谋求超克腐败统治的民主政治之理想,“的确凝聚了文化人对‘祖国’的向心力,加强了认同的皈依感。随着国民党统治下整体社会政治结构性的黑暗、腐败逐渐显露,三民主义中社会改革的理想又使左翼文化人据此追求‘民主政治’的实现。尤其在左翼人士主导的报刊杂志上,这是非常鲜明地蔚为当时主流的民主思潮”。^②左翼知识界对“三民主义”的理解、阐释与传播,既发展了“三民主义”的左翼和民主面向,又赋予了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对于光复初期台湾文化与思想重建意义尤其深远。

光复初期台湾知识分子对祖国大陆并不十分了解,对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充满期待,“除了学习国语热潮就是亟欲了解、阐述孙文的‘三民主义’政治理念”。^③钟肇政这样描述台湾人民对“三民主义”的热情。在光复初期,“日文版的三民主义人手一册,大行其道”。^④叶芸芸也曾指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册‘三民主义’,满怀抱负与热情,努力要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台湾’,比之日据时期,知识分子更形活跃。”^⑤因此“三民主义”热潮在光复初期的台湾一时风行,“随手翻阅当时的报纸,‘建设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几乎是每篇政论文章必呼的口号,但细读其内容,无论是官方或是一般的言论,大都是泛泛之论,并无特别的深意,唯独左翼刊物上的‘三民主义’论述,别有一番深意”。^⑥与一般媒体的宣传不同,左翼知识界启用“三民主义”概念自有深意,它构成左翼参与文化重建的一种思想方法。这种介入与参与基于左翼知识分子对“三民主义”概念及其时代意义的认知,“三民主义新台湾”成为台湾文化重建的愿景与方向,也是战后台湾社会凝聚人心、汇聚共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装置。诚如徐秀慧所言“台籍左翼文化人对三民主义的信仰,是基于社会革命的认识,他们以此为基准批判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的‘非民主化’,是阶级平等出了问题,而不是如同日据时期以民族平等蕴含了阶级平等的问题来批判日本帝国的统治。因此,是‘民主政治’出了问题,而不是‘民族的认同政治’出了问题。”^⑦

光复初期左翼知识分子对三民主义的接受与传播有其历史基础。日据时期孙中山思想对台湾进步知识分子已经产生深刻的影响,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先生曾四次到台湾传播革命思想。在孙中山的直接推动下,兴中会台湾分会和中国同盟会台湾分会相继成立。可以说,日据时期台湾进步知识分子对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三民主义”即有所了解,留日台籍知识分子在日本期间也接触过“三民主义”。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与思想的形成也是深受孙中山思想的启发。孙中山思想究竟带给台湾知识分子什么启发?1925年,左翼作家赖和在给孙中山先生写的挽词中表述得尤其清楚“当四万万同胞,酣醉在大同和平的梦境中,生息在专制忘我的传统道德下,嬉戏在豆剖瓜分的危惧里,使我们晓得有种族国家,明白到有自己他人,这不就是先生呼喊的影响。”^⑧在台湾光复前夕,《台湾新生报》的前身《台湾新报》9月即开始对

① 杨逵《“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彭小妍主编《杨逵全集》第10卷,第390页。

②③⑥⑦ 徐秀慧《光复变奏——战后初期台湾文学思潮的转折期(1945-1949)》,第127、113、114、127页。

④ 钟肇政《艰困孤寂的足迹——简述四十年代本省乡土文学》,《文讯》第9期,1984年3月,第123页。

⑤ 叶芸芸《试论战后初期的台湾知识分子及其文学活动》,台湾文学研究会主编《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湾文学研究论文精选集》,前卫出版社(台北)1989年版,第63页。

⑧ 《中山先生建国宏观与实践》,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2011年版,第16页。

台湾民众宣传国民政府接收的消息,如陈仪谈实行“三民主义”等等。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在政治思想上信仰孙文的三民主义,也彻底实施孙文辞世前的联俄容共政策,不同于国民党保守派的反共立场”。^①在此种情况下“国民党官方报刊杂志所反映的文化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延续,其文化宣传打的是‘三民主义的文化建设论’,针对台湾的殖民历史,宣扬‘民族主义’,延续抗战时期提倡‘民族主义文艺’的文化政策”。^②对于光复初期兴起的去殖民运动而言,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的“三民主义”无疑是重要的思想资源,也是对照批判现实的重要思想武器,这也是台湾知识界普遍认同“三民主义”的历史语境。

然而,在“三民主义”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却偏离了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政策的指向,也因此引起左翼知识分子的反弹。“官方的统治机构重临这块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的疆域,虽祭出孙文‘三民主义’的政治理念,但面对两岸社会、心理的隔阂,更多的时候诉诸的却是‘民族主义’的检验。台湾文化人本于对孙文革命和三民主义社会改革理念的认知,检视国民党政府‘三民主义’的政治宣传,口惠而不实,反过来以‘三民主义’批判政府的施政。其中经常被提举的就是‘民权主义’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③如杨逵创办《一阳周报》,以宣扬“三民主义”为主,提出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的文化重建目标。“发行《一阳周报》介绍国父思想与三民主义,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光复以后,在大家兴奋的心情之下,向民族、民权、民生努力建设,台湾一定可以成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④所以,杨逵创办、主编的《一阳周报》就成为光复初期台湾传播与研究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最重要的平台,大量转载或翻译孙中山的文章,包括孙中山的《中国工人阶级的途径》《中国革命史纲要》《欲改造新国家当实行三民主义》等,也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阐释“三民主义”思想的文章,如《三民主义大要》《关于三民主义》《孙中山传》等。据徐秀慧的研究“目前所知光复后最早积极宣扬三民主义、孙文思想的是左翼文化人杨逵率先发起的。他于1945年9月22日创办《一阳周报》。在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日’这一天创办的《政经报》,有关三民主义思想与台湾政局的关系之文章也一再出现,可以看到甫回归‘祖国’之际,与一般知识分子一样,左翼文化人在‘国府’尚未展开接收工作时,也急欲透过三民主义的学习、传布,努力使台湾与‘祖国’的政治、文化接轨,其中启蒙民众的政治意识、宣扬民权意识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⑤在光复初期的历史语境下,杨逵等左翼知识分子为什么要致力于发扬“三民主义”?为什么要纪念孙中山?如何纪念孙中山?杨逵对此有着很深刻的观察与思考。在《一阳周报》第9号发表的《纪念孙总理诞辰》一文中,杨逵首先提到纪念孙中山要深刻“认识先生的思想、斗志及为人,来规正我们的思想、斗志及为人,以继承先生伟大事业”。^⑥对于杨逵而言,孙中山思想在战后台湾社会文化重建的语境下意义尤为重要。杨逵的看法代表了左翼文化知识界的普遍共识,以继承孙中山思想、拥护三民主义的方式,光复初期的左翼知识分子重构文化认同,重建社会思想的基础。

同时杨逵又以先觉者的理智发出警醒“未战而得胜的台湾光复,虽是可庆可祝,总是因此若抱着中国革命为如桌顶拿柑之安易感,那就惨了。光复了后的新建设目前多难,民权民生的彻底解决尚有多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与主义的完善发展全挂在我们肩上。……千万不可抱着安易感,学日本绅士改装换面就傲然成了新绅士这样惨荷。此类是总理始终痛恨唾弃的劣绅。”^⑦诚如徐秀慧所言“甫光复一个月,杨逵并没有沉浸在‘未战而得胜’的、空虚的胜利感,也不是盲目地拥抱‘三民主义’,而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与主义的完善发展’,有待我们彻

①②③⑤ 徐秀慧《光复变奏——战后初期台湾文学思潮的转折期(1945-1949)》,第27、69、75、117页。

④ 杨逵《光复前后》,彭小妍主编《杨逵全集》第14卷,第13—14页。

⑥⑦ 杨逵《纪念孙总理诞辰》,《一阳周报》第9号,1945年11月17日。彭小妍主编《杨逵全集》第10卷,第211、211—212页。

底解决民权、民生问题,努力新建设,‘才得达到美满的社会’。从社会实践印证理论,一直是信仰社会主义的杨逵所身体力行的,他可谓清楚地意识到民主的成果是不可能不经过社会斗争而轻取的。从接收后的台湾社会弊病丛生可以证实杨逵的确有先见之明。”^①在1974年召开的“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上,杨逵提供了一份书面意见,再次阐述了其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内涵与意义的理解:“今日台湾要建设‘民有民治民享而均富’的三民主义模范省,就要切实记住孔子在‘大同篇’所表现的福利社会的构想与‘不患贫患不均’的观念,也要切实记住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教示。”^②从儒家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构想出发,杨逵提出了“中国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念。

同样是宣传“三民主义”,但需要加以区分的是,杨逵创办《一阳周报》宣扬“三民主义”思想,与国民党当局以“三民主义”收揽人心是两回事。杨逵希望以“三民主义”提高一般大众的政治意识,期望在对日胜利民族问题解放之际,民主、民权、民生的建设能透过民众的政治启蒙迅速步上轨道。这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被日本殖民统治压抑下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重新复苏的例证。

其他左翼知识分子也分别阐释了对“三民主义”的理解,进一步发展了“三民主义”的左翼面向。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进步文化人苏新和吴新荣发起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后苏新与陈逸松等人又发起成立“政治经济研究会”,创办战后台湾第一份白话文杂志《政经报》,集结左翼力量介入文化重建运动,主张以“三民主义”重建台湾。甘乃光在《政经报》1卷1号发表了《三民主义序》一文,认为“中山先生讲‘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其意就是孙文主义的终极目的是社会革命,是推翻资本制度的民生主义,是拥护最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民权主义,是将来消灭各阶级的民族主义,所以孙文主义是以国民革命为过渡,社会革命为目的的主义”。^③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出发,王白渊提出了“民主主义的美术”概念,藉以阐发台湾美术重建的方向。在左翼知识分子看来,继承孙中山的伟业就是要继承其社会革命的精神,继续推动阶级解放运动。

在左翼进步知识分子看来,“三民主义”是“改革社会的利器”,也是批判现实的思想武器。王溪森宣称“我们相信三民主义是革命的主义,在三民主义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也是革命政府,这种主义和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指导精神是根本不相容的;因此对于台湾的政务机关的接收就不是由帝国主义的政府移交给另一个帝国主义政府的接收,而应当是由帝国主义政府移交革命政府的接收……”^④正如台湾学者徐秀慧在《光复变奏——战后初期台湾文学思潮的转折期(1945-1949)》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左翼文化人将三民主义当作是改革社会的利器,他们对三民主义的热衷并不等于绝对拥护国民党政府,他们视三民主义为革命的主义,可作为建设新台湾的蓝图,所以尽管‘建设台湾成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是官方与民间文化人的共识,但是左翼文化人显然认为‘国民政府’不是革命政府,而近似于封建帝国主义的政府。”^⑤

综上所述,光复初期台湾左翼文艺理论思潮发展了“三民主义”论述的左翼维度,在论述策略上将左翼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接合以获得左翼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同时,“三民主义”思想也成为左翼知识分子针砭现实政治和批判社会现实的有力武器。

①⑤ 徐秀慧《光复变奏——战后初期台湾文学思潮的转折期(1945-1949)》,第118、122页。

② 杨逵《“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彭小妍主编《杨逵全集》第10卷,第390页。

③ 甘乃光《三民主义序》,《政经报》1卷1号,1945年10月。

④ 王溪森《起用台湾人才应有的认识》,《政经报》2卷1期,1946年1月10日。

二、“鲁迅不死”和“赖和犹在”

鲁迅文学及思想在台湾的传播和影响有三大高潮期：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运动萌生时期；第二次是在战后初期台湾文化重建时期；第三次发生在“解严”以后台湾左翼思想复活时期。至今，鲁迅的影响透过学院的教学和研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光复初期，两岸新文学运动合流。在文化与文学重建的语境中，大陆赴台的左翼知识分子和台湾左翼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推崇和阐发鲁迅的思想。1946年10月13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发起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活动，台湾知识界也热烈响应了这次活动。由台湾的左翼知识分子杨逵、谢雪红、杨克煌等人，与大陆来台湾的进步知识分子王思翔、周梦江、楼宪等人，以《和平日报》的副刊为阵地，连续推出纪念鲁迅的系列专辑。其中包括许寿裳的《鲁迅和青年》、胡风的《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杨逵的诗《纪念鲁迅》、颖瑾的《鲁迅先生传略》、黄荣灿的《中国木刻的保姆——鲁迅》、秋叶的《我所信仰的鲁迅》，以及黄荣灿的《鲁迅先生遗像》、耳氏的《母女》、陈烟桥的《高尔基与鲁迅》等版画作品。在两岸左翼知识分子看来，鲁迅无疑是台湾文化与文学重建至关重要的思想资源。

鲁迅生前好友许寿裳1946年出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致力于台湾文化的复归和重建工作。在他的构想中，台湾文化重建需要一次新的五四运动。“谁都知道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是扫除我国数千年来的封建遗毒，创造一个提倡民主，发扬科学的文化运动，可说是我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划时代、开纪元的时期。虽则它的目标，至今还没有完全达到，可是我国的新生命从此诞生，新建设从此开始。它的价值异常重大。我想我们台湾也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同时提倡民主、发扬科学，于五四时代的运动目标以外，还要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①在这一“新的五四运动”的构想中，鲁迅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从1946年抵台，许寿裳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鲁迅与青年》《鲁迅的德行》《鲁迅的精神》《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出版了《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开始向台湾知识界介绍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涉及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韧的战斗”精神以及鲁迅与台湾青年知识分子的交往关系等等。台湾本省的左翼知识分子杨逵、龙瑛宗、蓝明谷、杨云萍等也加入了传播鲁迅思想的行列。杨逵在《和平日报》和《中华日报》同时发表题为《纪念鲁迅》的新诗作品，表达认同鲁迅呐喊与反抗的战斗精神“呐喊又呐喊，真理的叫唤，针对恶势力，前进的呼声，敢骂又敢打，青年的壮志，敢哭又敢笑，青年的热肠，一声呐喊，万声响应，如雷又如电，闪闪，烁烁，鲁迅未死，我还听着他的声音，鲁迅不死，我永远看到他的至诚与热情。”^②在其翻译出版的中日文对照的《阿Q正传》的前言《鲁迅先生》中，杨逵进一步阐述了鲁迅精神的内涵“《阿Q正传》是先生的代表作，他向该诅咒的恶势力与保守主义宣告死刑。……主要恶势力与保守主义不扬弃的一天，我们绝对无法前进。”^③蓝明谷翻译了鲁迅的《故乡》，在前言《鲁迅的〈故乡〉》中同样强调了鲁迅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不妥协精神。1946年龙瑛宗在《中华日报》介绍鲁迅的《阿Q正传》，并且发表《中国现代文学的始祖》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如果说杨逵和蓝明谷强调的是鲁迅的战斗精神，那么龙瑛宗则侧重于阐述鲁迅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家果戈里及高尔基传统的联系，认为晚期果戈里陷入了神秘主义，而鲁迅却始终坚持现实

① 许寿裳《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台湾新生报》1947年5月4日。

② 杨逵《纪念鲁迅》，《和平日报》1946年10月19日。

③ 杨逵译《阿Q正传》，东华书局1947年版，第4页。

主义。

对于台湾左翼知识分子而言,鲁迅精神不仅是台湾文学重建的精神资源,同时也是批判战后台湾社会的有力武器。杨逵的《阿Q画圆圈》和杨云萍的《纪念鲁迅》,都从鲁迅出发尖锐地批判了战后台湾社会的现实。杨云萍如是而言“鲁迅尽其一生的血泪,所奋斗争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民生’的实现,却还在遥远的彼岸。台湾的光复,我们相信地下的鲁迅先生,一定感到欣慰,只是假如他知道现在本省的情形,不知要做何感想?恐怕他的欣慰,将变为哀痛,变为悲愤了。”^①纪念鲁迅、重读鲁迅,在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看来,其意义就在于以鲁迅为方法,以“新五四运动”为策略,上下求索,不断建构观察、思考与表现台湾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左翼之眼”和民族之魂。

总而言之,战后初期台湾左翼文学理论的发展是日据时期左翼思想与大陆新文学以来的左翼思潮更深更广的接合,在《幼春不死!赖和犹在!》一文中,杨逵曾经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我曾说过鲁迅不死,现在我还要以万分的确信再说,幼春不死,赖和犹在!他们还活在世间的时候,因为处境的重压,虽未得充分发挥其才能,但他们遗留给我们的断篇残迹,都是在叫我们认识他们的伟大的思想和气节。”^②对于台湾左翼知识分子而言,杨逵所坚定表达的“鲁迅不死”和“赖和犹在”,是批判思想和进步社会想象重建的不竭的动力,共同构成了20世纪台湾左翼思想的伟大传统。

三、《桥》副刊的论争与创作

1947年11月歌雷(史习枚)在《台湾新生报》创办《桥》副刊,成为“二·二八”事件后最重要的文艺阵地。《桥》副刊追求的是“人民的”“生活的”“战斗的”“革命的”“写实的”“人道精神”的文学,反对唯美主义和伤感主义的文学。从文学观念上看,《桥》副刊基本偏向于左翼现实主义的理论立场。从《桥》副刊创办伊始就展开了一场台湾文学思潮史上著名的关于台湾文学发展方向的大规模论争。关于这场论争的性质和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阐释。一种以叶石涛、彭瑞金和陈芳明等本土论者为代表,把《桥》副刊的论争化约为“台湾意识文学论”和“中国文学意识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另一种以陈映真和曾健民等为代表,认为《桥》副刊的文学论争“是一次继台湾从中国五四新文艺运动中汲取并承继其理论和创作、而展开台湾现代新文学以来,另一次汲取和承继中国三十年代文艺思想、理论和创作的重要历史事件”。^③根据曾健民和石家驹的分析和归纳,《桥》副刊的论争涉及的文学理论问题包括:1. 如何评价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性质和历史地位;2. 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的辩证关系;3. 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4. 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5. 两岸作家队伍的团结问题;6. “五四”的再评价;7.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等等。^④

《桥》副刊的文学论争是1945-1947年台湾文学与文化重建讨论的继续,是一种更深入的展开。《桥》副刊的文学论争涉及的问题颇为复杂,观点也存在分歧。但在台湾文学是中国

① 杨云萍《纪念鲁迅》,《台湾文化》第1卷第2期,第1页。

② 杨逵《幼春不死!赖和犹在》,《文化交流》第1辑,1947年1月15日,彭小妍主编《杨逵全集》第10卷,第236页。

③ 石家驹《一场被遮断的文学论争——关于台湾新文学诸问题的论争(一九四七—一九四九)》,《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人间出版社(台北)1999年版,第1页。

④ 参见石家驹《一场被遮断的文学论争——关于台湾新文学诸问题的论争(一九四七—一九四九)》,《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第14—31页。曾健民《在风雨飘摇中绽开的文学花苞——“台湾新文学论议”的思想和时代》,《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2期。

文学运动的一环、台湾文学具有特殊性以及重建台湾新文学等方面的讨论都取得了共识。从论争伊始,台湾文学发展方向问题始终成为人们思考的核心。杨逵发表的《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过去台湾文学运动的回顾》《作家到人民中间去观察》《寻找台湾文学之路》,以及在“桥”所举办的茶话会上的发言,一再强调文学的大众化和“反帝反封建与民主科学”的思想。欧阳明在《台湾新文学的建设》一文中呼应了杨逵的观点,认为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一环,其发展方向即是“继承民族解放革命的传统,完成五四新文学追求的‘民主与科学’主题”。孙达人的《传统、觉醒、改造——简论台湾新文学的方向》也认同这种观点,提出新文学还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崇高任务,台湾新文学的方向即在于继承“五四”、学习“五四”、跨过“五四”。这些论述引起了扬风、雷石榆和骆驼英等人之间关于学习“五四”还是超越“五四”的论争。扬风认为不必向“五四”看齐,因为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改变了。雷石榆的《形式主义的文学观——评扬风的“五四文艺写作”》批评扬风犯了形式主义的“机械的唯物论”错误,雷石榆和骆驼英都认为尽管中国社会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仍然走在“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道路上,所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前提也依然是反帝反封建的。

战后台湾文化建设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精神?如何理解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台湾的文学重建需要什么样的现实主义?这个关涉文学发展方向的重要课题引起了文论界的广泛关注。作家阿瑞提出了台湾文学发展的一种方案,即走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的“狂飙运动”道路。因为“狂飙运动”可以打破台湾文学发展因日本殖民统治所形成的各种精神障碍,破除狭隘的观念,解放个性发展创造精神,由此引发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论争。扬风在《文章下乡》一文中,反对阿瑞“狂飙运动”方案,坚持“现实主义的大众文学”。雷石榆则认为浪漫主义确有解放思想、开放个性的意义,但要建立更高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完成从个人中心到群体中心、从浪漫精神到科学的认识论的转变,还必须依靠“新现实主义”。雷氏突出了“新现实主义”中的浪漫主义个性因素,扬风则强调“新现实主义”的阶级性,彻底否定浪漫主义的个性和主观性。雷石榆援引高尔基的论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认为浪漫主义有消极积极之分,“新写实主义”是写实主义与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矛盾统一。从新现实主义论争可以看出,光复初期,由于两岸文学的合流,大陆30年代的左翼文论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文论已经开始进入台湾文艺思想界,逐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光复初期的各种艺术门类在创作上也因应着此一时期的左翼文艺理论思潮。首先,在文学创作上,仅以叶石涛为例便足以说明左翼思潮影响的深刻性。众所周知,叶石涛在日据时期的文学创作倾向于耽美的浪漫主义,而光复初期,他发表了多篇小说,其中在《新生报》副刊《桥》上的作品既有历史题材,如《河畔的悲剧》《来到台湾的唐·芬》《澎湖岛的死刑》,也有现实题材,如《三月的妈祖》等。与钱歌川建议台湾作家应该取材于“历史”有所不同,陈显庭希望叶石涛的题材“取自目前或不久以前的台湾现实社会”。在对台湾的旧道德和旧社会投掷觉醒的、促进步的火炬的同时,不妨把自己的理想表现出来,“因为台湾的现实社会里有莫大的题材等候着生长于此地域的作者来描写,揭露。更有从沉寂而将要摆脱和跃动的社会,以及由好久的消沉将要奋起前进的广大人民正渴望着引导的力量与推动的力量”。^①最后,作者认为叶石涛生长于本省,对于它的一切动态是最能够如实地描写出来,因此希望他通过丰富的情感的洗练创作出比过去更完满的更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来。

陈显庭提出“题材取自目前或不久以前的台湾现实社会”的建议,很明显地体现在叶石

^① 陈显庭《我对叶石涛作品的印象》,《桥》第146期,1948年7月30日。

涛此后的小说题材选择的变换,《三月的妈祖》^①即由历史题材转向现实题材。小说《汪昏平·猫和一个女人》^②以男主人公汪昏平的生活为描摹对象,探讨台湾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而思考台湾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应该如何选择。出身于地主家庭,经济富裕的昏平脱离现实生活,整日沉浸在耽美的幻想世界中,他爱上有夫之妇的日本女人沙美,二人由精神爱恋到发生肉体关系,经过分分合合,“在满足了动物的自我欲望以后也会陷入倦怠与争吵”,后来昏平养了一只猫取名沙美,猫成了沙美的代替品,忍受着昏平的喜怒无常,“有时候觉得这猫可爱,那是回忆往日的和沙美的甜乐。但是一转念头,想到和她分离,我又立刻觉得这猫讨厌可恨”。作为朋友的“我”希望昏平能够脱离幻想步入现实,到乡村通过劳动来融入人民——作者相信“耕作荒芜地,那才是调和我现在的思想与生活的方法。从这出发点我们开始前进,然后定会有一天与农民共同解放。我相信这日子的到来。我也希望昏平有一天会来跟随我们的道路”。

对于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的思考,在《新生报》副刊《桥》上的论争中曾讨论台湾文学是新现实主义的人民群众文学,欧阳明在《台湾新文学的建设》^③中指出“让新的文学走向人民,作为人民自己的最大的力量,创造今天人民所需要的‘战斗的内容’‘民族风格’‘民族形式’。”“适合于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和兴趣,适应今日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现实的,让走向人民的文学,作为人民战斗的力量,为和平、团结和民主而奋斗。”扬风配合欧阳明的主张,他的《新时代,新课题——台湾新文艺运动应走的路向》^④也同样强调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除此之外,他更认为“一个忠实的文艺工作者,必然的是应生活在大众的中间。他是属于大众的,他的声音应该是大众的声音。”

对于以上观点,在2011出版的《台湾新文学史》中,陈芳明则不以为然又略带嘲讽地认为“作家若是大众的代言人,则事件后,台湾社会的恐慌、冷漠景象,必然会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为何当时的本省作家没有写出来?而主张大众文学的外省作家也没有写出来?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之下,提倡大众文学是非常虚伪而虚构的。”^⑤而事实上,为陈芳明所尊崇的叶石涛就恰恰回应了当时论争中所涉及的大众文学的主张,并反映在其文学作品当中。叶石涛在主张大众文学之前,首先在作品中对于台湾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持批判态度,在《三月的妈祖》中“律夫失业,由妻子出卖肉体来养他,绝不是丈夫的行为。叶石涛如此刻画律夫的软弱,含有象征性的批判意义,触及了台湾知识分子的丑陋面,空有理想而缺乏行动力”。^⑥在《汪昏平·猫和一个女人》中作者这样描写“昏平就是台湾知识分子的一型。不断地怀抱着想脱离这地上,而到天国的幻想,无异是一种抓住自己的头发,而努力于离开大地,升飞天空的幼稚的尝试,并且人们的脚是绝不能脱离地上的哭笑欺骂的世界啊。我想就是这原样的世界才好。这里几多的新社会的种子在萌芽生育,可以战斗着期待明天的再生的降临。”这里作者一反其以往浪漫主义主张,认为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现实,作者借助小说人物之口,阐述自己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认为应该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脚踏实地、立足现实,通过辛勤的劳动来改造生活,改变命运,惟其如此,才能实现美好的社会愿景。作者遗憾地描写道“但是昏平对自己过于忠实,他或许要一生追求他的幻梦。他一定要离开被虐驱着的一群,沿着他的灭亡的道路;否认一切人们权利,嘲笑与生活的真挚的斗争,高举空洞美学论和诡辩前进的。”对于昏平的这

① 叶石涛《三月的妈祖》,陈显庭译,《桥》第212期,1949年2月12日。

② 叶石涛《汪昏平·猫和一个女人》,潜生译,《桥》第154期,1948年8月18日。

③ 欧阳明《台湾新文学的建设》,《桥》第40期,1947年11月7日。

④ 扬风《新时代,新课题——台湾新文艺运动应走的路向》,《桥》副刊第95期,1948年3月26日。

⑤ 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上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11年版,第258页。

⑥ 林瑞明《让他们出土——台湾新生报(桥)副刊小说选介》,《台湾文学的本土观察》,允晨文化(台北)1996年版,第69页。

种行为,作者认为只有通过劳动,并且与人民大众相联系才可能得到救赎。“我想一生轻蔑劳动的他,现在只有用劳动来将他从观念的思想的迷宫里引导出来。他就因为过度的吸取食物而无事做,悠闲度日,才会在当几乎是大多数者都正呻吟在饥饿的时候,作着这种无意义的戏弄似地爱的余裕,因为我过高地评价昏平和热情,所以很替他可惜。他不知道除了与人民大众联系的热情而外,在今天的世界上,空空无用。并且昏平自失掉了沙美以后更加深了他的虚无的梦幻,而步步深陷不可救的黑暗里。”于是“我希望昏平能够自我反省‘昏平,你需要反省,我知道不必向你唠叨细讲。在物价高压下的人民的困苦,你自己是有着判断力的。’但是昏平却‘半声不响,一劲儿地摸抚着猫。好像身在梦中似的,他一定在回忆那妖爱的美丽的沙美的爱,再看到他的态度以后,我知道他已经没有药可救了’”。

作者在作品中批评台湾知识分子脱离人民大众没有改造社会的能力。“他所需要的是美,他也没有听到人民的呻吟,更没有改造社会的气力,只为了充满自己的欲望而生存着。他不存有一个为人的条件。巴尔扎克曾经说‘人间里存在着一些蛆虫或百足虫’。失掉了青年的生命和同胞爱的他,正好像一条小昆虫……他只有冷却了的否认一切的虚无的思想。对于我们两个人的思想如此的背驰,我并不感觉奇怪,因为站在五十顷地佃农们的血汗上,裕余的地主的生活是足以使他麻木的。我很惋惜昏平的才能,但是我们的道路这样截然地被分开,昏平说我是被赶出乐园了的亚当;他是觉悟我所想着的一切尽是悲观的吧。他不能捉摸我底生活,甚至在我心中燃照着的太阳……我饥饿、寒苦,但确信着有一天的到来而养活着老母和兄弟。汗流浃背的劳动着的姿影是那慈祥的驱马拖着重量的车子的姿影。”作品中的“我”对自己进行自我批评与反省并且清算思想中存在的落伍观念,“我所想象的是被包裹在清丽的美和健康的田园,但现实的农村却仅有不卫生,蓑笠、猪牛、粪尿和粗陋的食物。渐渐地我知道我的错误了。在我的思想的一隅也许还存在着幻想的落伍的思念,我开始对它清算。在起初虽然发了一些悲鸣,但逐渐地我对现实屈服,然而这却是我的胜利;我会爱上了眼前的原样的农村。”

陈建忠指出“当我们再把左翼精神与历史题材小说并而观之,我们便能同意林瑞明对叶石涛小说的评论,无论是取材历史或当代,‘寓意反抗’的精神则一。……让问题回到叶石涛重新挪用台湾历史题材的问题上来。一个被殖民者既受殖民教化,又对台湾乡土主体力图捍卫的现象,如果由中国民族主义观点来看自然有所谓‘奴化’或‘分离主义’的嫌疑,事实上是无法被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战后初期的台湾人多半还是以汉民族的立场来迎接中国国民党的接收,这点叶石涛亦没有例外。……当叶石涛不再被浪漫主义文风与皇民化思想所俘虏后,经由战后初期祖国梦幻灭的过程,他展示了经由殖民遗产所获致的历史视野与文学才情,转而将这些历史与文学赋予‘现实’的向度,也微弱地继承了台湾日据以来左翼的传统。这复杂而多层次的认同经验,无疑是值得仔细思索的殖民地心灵现象,绝未能以一句‘变色虫’或‘机会主义者’率尔否定其所具备的严肃历史意义。”^①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叶石涛光复初期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亦不可轻易以“变色虫”或“机会主义者”形容其文学生涯与创作取向的多次转折,但不可忽视的是,在钱歌川与陈显庭“历史”与“现实”的召唤之下,有了叶石涛光复初期《桥》上的作品取材倾向转变的事实,应不仅仅只是历史的机缘巧合而已。评论家们在给予叶石涛光复初期文学各种美誉之前,都应该综观此一时期文学场域中的相关论述,尤其是要从时间上兼顾钱歌川《如何促进台湾的文学运动》^②与陈显庭《我对叶石涛

① 陈建忠《从皇国少年到左倾青年:战后初期叶石涛的小说创作与思想转折》,《被诅咒的文学:战后初期(1945-1949)台湾文学论集》,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7年版,第98-99页。

② 钱歌川《如何促进台湾的文学运动》,《中华日报》副刊《海风》1948年5月13日。

作品的印象》^①对叶石涛光复初期创作转变的影响。更不应忽视的是战后初期左翼文艺思潮对于文学、美术、音乐等艺术创作的影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出发,我们认为光复初期叶石涛虽然一度转向左翼社会主义,但不能据此忽略日据后期叶石涛“皇民少年”的历史事实,更不能据此否定叶石涛后期转向分离主义的历史事实,对他的这一错误转变必须给予严肃批判。

四、新现实主义与“民众的美术”

光复初期的美术创作与批评,也回应着左翼文艺理论思潮,构成这一时期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部分。据梅丁衍教授研究,祖国大陆木刻界“最早抵台者是黄荣灿。在1946年元旦的《台湾新生报》特刊中,黄氏的木刻《重建家园》与长官公署官员们的元旦贺词并列。《重建家园》虽为抗战期间的旧作,但此时被《新生报》当做台湾战后第一个元旦的新愿望,这不但提示美术界:一个与殖民美术风格全然不同的画种已登陆台湾,同时也宣告一个反映现实生活的美术意识即将展开讨论”。^②黄荣灿的重要作品《重建家园》在《新生报》的发表意味深长,既意味着以“帝国画展”风格为主流的“殖民美术”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民族的、大众的、左翼的新现实主义美术思潮虽然还很弱小但已经来临。

与鲁迅渊源很深的左翼木刻家黄荣灿抵台后,注重与台湾艺术家的交流,“与日籍画家如立石铁臣、作家滨田隼雄、池田敏雄、西川满有过接触,他与苏新、周青、杨逵等台籍左翼作家也有往来。黄荣灿可以算是光复初期外省美术家之中,真正落实交流的人物”。^③在抗战时期已经介入左翼木刻运动的黄荣灿始终坚持“新的现实主义的中国美术”观念,把服务现实、改造现实视为自己的艺术理想,并且不遗余力地在台湾美术界宣传、推广左翼木刻美学。在《新生报》“桥副刊”、《台湾文化》(杨云萍主编)、《人民导报》《和平日报》等杂志报纸上,黄荣灿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左翼木刻艺术和阐述新现实美术思想的文章,其中包括《新兴木刻艺术在中国》《关于造型艺术》《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木刻家克拉甫琴珂》《新现实的美术在中国》《美术教育与社会生活》《工艺、生活、社会、科学的基础》《正统美展的厄运——并评三届〈省美展〉出品》等等,较为系统地阐发“新现实的美术”观念,促进台湾地区左翼美术理论与批评的发展。黄荣灿认为,建设“新现实的美术”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这个课题是时代交付给艺术家的使命与任务,“历史要我们完成它,而同时,我们也要完成这新现实主义的美术历史。在这满目创伤的中国,历史不允许艺术黑暗时代的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在中国存在。历史却要新的现实主义的美术在中国茂盛,因为我们应该非服务现实的理想,去改造现实生活的一切,提高到一个健全的全体不可”。^④这无疑是基于历史条件、时代语境和左翼民族立场对中国文艺走什么样的道路所做出的判断与选择。黄荣灿主编的《南虹》副刊发表了《向人民大众学习》(郭沫若)、《怎样利用假期》(黄荣灿)等一系列带有左翼观点的文章,倡导文艺要努力“回到民众中去”“接近人民大众”“为人民服务”。黄荣灿还提出艺术家要加强学习和自我改造,努力担负起时代交付的新文化建设使命:一是要努力“放弃小市民个人主义,走进广大人

① 陈显庭《我对叶石涛作品的印象》,《桥》第146期,1948年7月30日。

②③ 梅丁衍《光复初期的台湾美术发展(1945-1949)》,黄俊杰编《光复初期的台湾:思想与文化的转型》,台大出版中心(台北)2005年版,第321、330页。

④ 黄荣灿《新现实的美术在中国》,《台湾文化》第二卷第3期,1947年。

民之中”^①；二是要“加强民主武器的力量”，努力“把艺术从剥削者手中还给人民”。^②从概念、术语到观念都可以看出，黄荣灿的“新现实的美术”思想受到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的深刻影响。

黄荣灿对于光复初期左翼文艺建设的意义在于将鲁迅的文艺思想和祖国大陆的左翼美术思潮以及苏俄革命美术传统引入台湾，为战后台湾的文化艺术重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左翼思想资源和美学形式，为两岸左翼文艺的汇流与深度融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黄荣灿深刻地介入战后初期台湾美术重建运动，对台湾的美术展也给出自己敏锐的观察与意见，依据自己的左翼艺术理论主张对于艺术创作进行切中肯綮的批评与指引，他在《新生报》的《桥》副刊发表《正统美展的厄运》等重要评论，对因袭“总督府展”旧制的“省美展”“台阳展”以及脱离现实与民众的“沙龙美术”等都做出尖锐的批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画家认识不清现实的方向，在他的作品上能说是正确思想情结的表现吗？”在他看来，台籍画家“应该多注意意识，以创作引领生活向上”。黄荣灿批评“省美展”等所谓“正统美展”的作品徒有颜色外表或只表现出技巧的“自大”，内容却游离于台湾的社会现实，因此缺乏时代性、民族性和真正的生命力，“这可以视为大陆来台左翼美术家在经历四年的省展观察后所提出的总结”。^③

黄荣灿不仅在观念上倡导“新现实的艺术”，而且在艺术创作上也矢志不渝地践行“新现实”精神。《建设家园》《不能忽视的现象》《失业工人待救》《拾碳渣的孩子》《米又涨价》《工事》《运碳》《落花生之收获》等都是具有“新现实”精神和人民性内涵的作品，用独特的木刻叙事或素描语言诠释“人民的艺术”和左翼进步美学。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以二二八事件为主题的版画《恐怖的检查》，直面事件真相，从左翼观点出发见证二二八事件，留下二二八事件的木刻叙事。黄荣灿的左翼思想和批判精神，不见容于此后的白色恐怖统治，也因此而罹难。黄荣灿的牺牲是两岸左翼思想和文艺创作的一大损失，也见证了20世纪50年代台湾左翼被压抑、被湮灭和被镇压的黑暗历史。

台籍画家李石樵的创作也受到左翼理论的影响，尽管其在后来的创作中曾受到黄荣灿的批评，但早在1946年9月12日举办的一场讨论台湾文化前途的座谈会中，李石樵就曾提出艺术和文化属于民众的主张：“只有画家本人可以了解，但他人无法了解的美术，乃是脱离民众。这种美术不配称为民主主义文化。若今后的政治属于民众时，艺术和文化亦应属于民众。所以，此后的绘画取材须循着这个方向来考虑。放弃制作徒然外观美丽的作品，而创作出有主张与意识形态的作品吧。”^④这一时期李石樵倡导“民众的美术”，其代表作品《市场口》《建设》《田家乐》等就是左翼美学影响下的反映现实、批判现实之作，其真诚的创作态度、直面冷酷现实的精神和“新现实主义”美学取向受到左翼理论家王白渊和苏新等人的高度认同与评价。苏新十分赞赏《市场口》，在其主编的《台湾文化》第三期封面隆重推出，并且称赞《市场口》“宛如把台湾现状缩写在一幅图”。^⑤王白渊指出，李石樵的《市场口》《歌唱》等作品显示出艺术家的题材选择、创作态度和审美形式等方面都产生了根本性转变，表明李石樵的美术创作已经彻底跳出了日据时期“沙龙美术”的美学陈规与窠臼，直面残酷的现实。《市场口》的创作成为李石樵转向民众美术的重要转折点。诚如梅丁衍所言“李石樵的画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显示李氏的创作理念已受到当时左翼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台共党人苏新还曾经为李氏的画做过辩解。可以说，在‘文化协进会’正式成立之前，日据时期的左翼社会运动人士与来自

① 黄荣灿《从学习说起》，《人民导报》1946年1月28日。

② 黄荣灿《创作木刻论》，《和平日报》1946年12月1日。

③④ 梅丁衍《光复初期的台湾美术发展(1945-1949)》黄俊杰编《光复初期的台湾：思想与文化的转型》第336、326页。

⑤ 苏新《也漫谈台湾艺文坛》，《台湾文化》第二卷第1期，1947年1月。

中国大陆的左翼人士,已经形成共识,即以提升人民的现实生活为愿望,并以此促成台湾新文化的向上发展。”^①李石樵的美术创作在题材选择和美学表现形式上都鲜明地体现出左翼现实主义的风格和特点。

这种左翼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持续到二二八之后的美术创作实践。“1947年10月,在历经二二八镇压之后,第二届省展仍然顺利举行。除了李石樵依旧坚持现实主义画风,展出《建设》巨作之外,外省籍画家也有人送件展出。”^②两岸画家在创作实践上相互借鉴,在普罗题材的选择上达成默契与共识,“大陆画家开始参与省展,说明两地美术家在适当交流与观察环境之后,彼此的美学理念已经微妙地相互渗透。以李石樵的《建设》油画来看,他已将上一届省展描绘《市场口》的普罗题材,转为更具指标意义的劳动阶级(在画面左侧仍然保留着卖烟的小孩)。李石樵以《建设》为题,在构图与角色的选取上,或许也受到黄荣灿《构筑》一作的启发,从这一个面向看来,当时两地美术家在主题意识上已经有了一定的默契。”^③这种默契体现在作品题材与美学形式的选择上。“今日美术必须要有主题意识,确立自己的目标,从现实中探索美的题材与富有美感价值的艺术。绘画当是社会的反映,须与大众结合。”^④黄荣灿、朱鸣冈、麦非、荒烟等大陆来台的木刻艺术家们倡导并实践以左翼为意识形态底色的“新现实主义”,李石樵等本地艺术家也逐渐转向左翼观念、普罗大众题材与美学表现风格,形成两岸左翼美术思潮汇流并逐渐壮大的局面。

五、麦浪歌咏队的人民美学

光复初期台湾音乐戏剧表演方面的左翼倾向同样十分鲜明。台湾报导文学作家蓝博洲记录了麦浪歌咏队的形成过程与细节:“1946年,台大工学院学生和一些青年军,一共十几个人,首先在台大成立了一个小规模合唱团;因为大家都是唱‘黄河大合唱’长大的,故取名黄河合唱团。到了‘二二八’后,黄河合唱团获得许多同学的共鸣,参加的人也愈来愈多,于是就在黄河合唱团的基础上,扩大为一个大概有三、四十人的、大型的学生文艺社团——麦浪歌咏队。”^⑤从“黄河合唱团”的成立到“麦浪歌咏队”的组建,我们从命名就可以看出,这个影响深远的大学生文艺社团与中华民族精神和现代左翼文艺传统的传承关系。

麦浪歌咏队的核心成员黄荣灿、王耀华、周自强、简义村、刘登元等组织参加过多次演出,并且“在演出手册上公开提出‘留意一切的民歌’的艺术主张。它宣称‘在辽阔的田野上,零星的村落里,到处激荡着恬畅空气的,是人民自随的歌唱,如今我们把民间朴实的歌声带来了!’此外,它强调要‘把音乐与人民对合理与幸福的争取结合着!把自己呈现给这苦难的大地和沉毅的民族,以深切的爱去拥抱这巨大的民族,心与人民的心扣在一起,共同看脉搏。’”^⑥麦浪歌咏队的艺术表演实践将文艺的人民性、民间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深入台湾民间社会,紧扣时代脉搏,弘扬沉毅的民族精神和乡土文化精神,为人民歌咏,为苦难的大地咏唱,以表演艺术的形式生动地传达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的理想。

从节目单来看,麦浪歌咏队的表演实践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合唱、舞蹈、歌剧、民歌独唱等。据蓝博洲的研究,在一连三天的歌谣舞蹈晚会上,麦浪专场演出的内容包括“1. 齐唱《大家唱》《别让它遭灾害》《祖国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青春战斗曲》《跌倒算什么》

①②③ 梅丁衍《光复初期的台湾美术发展(1945-1949)》,黄俊杰编《光复初期的台湾:思想与文化的转型》,第328、332、334页。

④ 李石樵《台湾文化》第1卷第3期,1946年12月1日。

⑤⑥ 蓝博洲《光复初期的台北学运(1945-1949)》,黄俊杰编《光复初期的台湾:思想与文化的转型》,第64、66页。

《光明赞》等曲目。2. 舞蹈《康定情歌》《马车夫之歌》《朱大嫂送鸡蛋》《青春舞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王大娘补缸》《都达尔和玛丽亚》《插秧谣》《一根扁担》等各省民谣。3. 歌剧《农村曲》(三幕)。4. 民歌独唱《苦命的苗家》(女声)和《控诉》(男声)。5. 合唱《祖国大合唱》。”^①这些曲目都是祖国大陆人民群众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在这些音乐作品中,有延安文艺运动时期的优秀作品,如《祖国进行曲》就是晋察冀边区艺术家践行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优秀成果,有左翼新音乐运动的产品如《大家唱》《别让它遭灾害》,有民歌民谣如《康定情歌》,还有《你是舵手》等祖国大陆青年学生参与爱国社会运动的作品。麦浪歌咏队表演的秧歌等解放区文艺形式受到民众和文化人的热烈欢迎,延安文艺精神在台湾地区得到了传承与发扬。这些演出无疑都显示出麦浪歌咏队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的倾向。

在《我们到台中来》一文中,麦浪歌咏队清晰地阐述了其文艺观点“民间歌舞是人民劳动动作的影响与表征,其情调是健康、热情、充满活力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歌舞逐渐被有闲的资产阶级的萎靡颓废的音乐和舞蹈排斥而旁落……我们认为健康的歌和舞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意识必须更有劳动的积极性,它必须鼓励起人民劳动的热情,激发人民进取创造的精神。”^②麦浪歌咏队坚持的是人民的文艺和劳动的文艺,反对资产阶级颓废的、萎靡的、没有生命活力的艺术与美学,认为只有来自劳动生活并表征劳动生活的、积极性的文艺才是健康的。麦浪歌咏队努力践行“人民文艺”“革命文艺”“民族文艺”“大众文艺”“民间文艺”“乡土文艺”相结合的左翼进步理念。

有论者从纯粹美学的角度批评《王大娘补缸》舞蹈是没有美感的“滑稽戏”。蔡史村回应指出:麦浪歌咏队的意义不在于表演技术的精湛,而在于把祖国各地人民的声音和群众的语言带到台湾来,是“撒一把种子在这块贫乏的土地上”。“这次歌谣舞蹈的演出,唱出来的是人民真正的声音,舞出来的是人民真正的生活,从音乐戏剧的角度上去看祖国文化,这里就是祖国文化的核心。”^③祖国文化、人民的生活与劳动者的声音成为麦浪歌咏队演出的主旋律。

麦浪歌咏队的演出活动得到了现代左翼作家的关心爱护与大力支持。“杨逵还特地安排本省籍的‘银铃会’成员(主要是师院学生朱实、林亨泰、萧翔文等人),假台中市图书馆举行了一场以‘文艺为谁服务’为主题的欢迎麦浪歌咏队的座谈会。萧翔文说:台大麦浪歌咏队‘朴素、热情、健康的歌声,带给了当时因阴影笼罩而显得有些沉闷的台湾社会,一阵清新的风。’同时,他也认为:杨逵先生也很可能是因为‘有感于台大麦浪歌咏队这种民谣演出,有其不可忽视的力量(启蒙大众的思想,改善社会风气),才开始热衷于之后的一连串的民谣创作工作。’”^④座谈会以麦浪歌咏队的艺术实践为中心,把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提了出来,参会者中还有人介绍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内容与精神,在此基础上讨论人民概念的历史内涵与范围,探讨战后台湾文艺的人民立场与发展方向。杨逵曾经创作了一首短诗,对麦浪歌咏队的人民性实践和人民美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麦浪、麦浪、麦成浪;救苦、救难、救饥荒。”^⑤并建议演出《补破网》《收酒瓶》等台湾民歌民谣,杨逵的儿子等台中少年参与了《收酒瓶》等的演唱。同时,杨逵还在《中华日报》发表了《介绍“麦浪歌咏队”》一文,从开拓“人民文化”和人民美学的层面高度评价麦浪歌咏队的文化播种意义:“‘麦浪歌咏队’这一次的表演是把全国各地(如西藏、新疆、东北、山西、河南等地)的民歌民谣介绍给我们的,当然不是创

①④ 蓝博洲《光复初期的台北学运(1945-1949)》,黄俊杰编《光复初期的台湾:思想与文化的转型》,第66、70页。

② 麦浪歌咏队《我们到台中来》,《台湾民声日报》1949年2月8日。

③ 蔡史村《从“麦浪”引起的》,《新生报》副刊《桥》第216期,1949年2月23日。

⑤ 参见蓝博洲《秧歌·台北——台湾新文艺运动的青春之歌》,《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1期;方生《杨逵与台大麦浪歌咏队》,《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1期。

作,可是这正如播种的人们一样,对开拓台湾人民文化是有意义的……”^①在杨逵看来,麦浪歌咏队的表演实践是一种文化行动主义,体现了艺术与人民的真正结合,体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一实践可以起到鼓舞作家、艺术家去努力表达真正的人民思想与感情,激励广大文艺家努力探索和追求纯真、朴素而活跃的美学表现形式。麦浪歌咏队的实践也给予了杨逵精神上的鼓舞,坚定了老一辈左翼作家对台湾文艺重建和大众文艺建设的理想与理念。麦浪歌咏队与左翼作家杨逵以及银铃会青年作家群的联系与互动为营造光复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提供了一种实践范式,他们之间相互启发与互相激励,对台湾左翼文艺运动的开展可谓意味深长,成为左翼社会主义精神传承的一种表征,也是左翼文艺思想和批判精神历史性锻接的生动实践。

麦浪歌咏队曾经发表了一封题为《告别台中》的公开信,公开信最后强调“各界热心的先生们、同学们!我们虽然暂时跟台中告别,但我们的精神将永远联系在一起,在‘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下,让我们齐一步伐,携手前进!”^②进一步宣示了台湾一代进步文艺青年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决心。

现今看来,麦浪歌咏队在台湾左翼文艺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重要的意义:第一,麦浪歌咏队的文艺实践昭示了一个重要的左翼美学原则:真正的左翼文艺精神必须是人民性、时代性、民间性与民族性的高度融合;第二,麦浪歌咏队的实践表明,深入民间、深入人民之中,成为人民的一分子,不断树立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与宗旨,是左翼青年文艺知识分子成长的正确道路;第三,麦浪歌咏队的实践表明,左翼文艺精神的重建必须重视思想的传承,必须重建思想传统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第四,麦浪歌咏队的实践还表明,两岸左翼精神的汇流和融合是左翼力量不断壮大的重要路径。麦浪的精神是对五四新文化精神和抗战文艺传统的传承,是对日据时期以杨逵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行动主义和人民美学的继承与发扬,同时也是20世纪70年代台湾乡土文化运动、校园民歌运动以及1980年代《人间》杂志深入民间的左翼实践之先导。对于新世纪台湾左翼的重建与再出发而言,这条左翼思想与文艺精神的脉络尤其值得关注与研究。

六、结 语

综上所述,由于两岸左翼思想的汇流和融合,台湾左翼思潮在光复初期快速复苏并发展壮大,形成左翼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相结合的思想主潮和文艺创作主流。左翼文艺广泛而深刻地参与了战后台湾的文化重建运动,开拓和发展出了文化重建层面上左翼的、民族的、大众的进步方向,在“去日本化、再中国化”运动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20世纪台湾社会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期,光复初期的左翼思潮向上承接了两岸现代左翼革命文艺传统,向下又开启了70年代“保钓”和“乡土文学论战”等左翼文艺运动,影响深远。现今,光复初期的左翼思想仍然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重启这一思想资源对于正本清源和批判“独派左翼”,对当前台湾左翼文艺美学与批判思想的重构与再出发也深具历史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郑珊珊 陈 执)

^① 杨逵《介绍“麦浪歌咏队”》,《中华日报》1949年2月19日。

^② 麦浪歌咏队《告别台中》,《台湾民生日报》1949年2月12日。